



朝鲜—韩国研究丛书二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

『朝天录』中的 明代中国人 形象研究

杨昕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论集
(第XI辑)

A Study of
Image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Works of
Korean Envoy's
Travel Accounts to
Ming Empire

杨昕 著

『朝天录』中的 明代中国人 形象研究

A Study of
Image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Works of Korean Envoy's
Travel Accounts to Ming Empire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论集
(第X辑)



朝鲜—韩国研究丛书二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天录”中的明代中国人形象研究/杨昕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097-8248-4

I. ①朝… II. ①杨… III. ①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明代 IV. ①D829.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7505号

“朝天录”中的明代中国人形象研究

著 者 / 杨 昕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冯立君 董风云

责任编辑 / 柏 桐 冯立君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4.75 字 数:247千字

版 次 /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8248-4

定 价 / 7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纵观整个亚洲的古代历史，在中国的诸多邻国中，朝鲜无疑是与中国交往最为密切的国家。朝鲜与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两国典籍中关于彼此间交流交往的记载汗牛充栋，俯拾皆是。朝鲜通晓汉文，熟习朱礼，以“海外小中华”自称，在长时间接受汉文化熏陶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思维和民族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接触和碰撞，受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地理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朝鲜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朝鲜王朝第十四代君主宣祖李昖甚至以父子来形容两国之间的关系：“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①

在两国长时间的交往交流过程中，朝鲜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在游历中国的时候都留下了为数众多的描写中国的文字。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根据自己的想象、体验和需要，描述各自眼中的中国，塑造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的中国形象。德国学者狄泽林克认为：“我们必须强调的最后一点是，文学世界中产生的形象作用于人类一般生活乃至社会和政治活动。”^② 特别是14世纪以降，相比亚洲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而言，朝鲜可以说是中国形象最为活跃的塑造者。朝鲜留下的纪行中国的文字蔚为大观，这些数量庞大的叙事来源于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的叙事策略，被不同身份和阶层的人物所书写，因而彼此之间呈现出相当大的差异，从而导致了朝鲜眼中中国形象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

① 《宣祖实录》卷37。

② 方维规：《比较文学想象学》，《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3期。

深刻地影响了朝鲜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有明一代，朝鲜十分重视发展与明的友好关系，往来于朝鲜半岛和中国之间的朝鲜使节络绎于路。根据统计，仅朝鲜太祖、太宗时期，朝鲜前往明朝的使行次数就分别为57次和137次，年平均出使次数达到8次和7.6次^①。在1368年明朝建立至1637年朝鲜朝屈服于清政权、解除与明政权宗藩关系的这一时期，朝鲜使臣留下的大量的纪行中国的文字统称为“朝天录”。其体裁包括诗歌、日记、杂录、记事等；其作者包括朝鲜派往中国的正、副使和书状官，以及使节团中的随行人员；其记载内容包括有明一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地理、市井风情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它具有记录年代跨度大、体裁多种多样、作者成分复杂、行文风格直笔直言等特点。它是学界研究朝鲜眼中明代中国形象的巨大宝库，也是数量众多的域外汉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天录”这一称谓，集中反映出朝鲜对明朝的心态，反映出了明与朝鲜的总体关系。朝鲜使臣认同明朝的正统性质，在游历中国的过程中，他们炫目于明代中国发达的社会经济，惊叹明代中国强大的军事力量，艳羡明代中国灿烂的社会文化，并将这一切诉诸笔下，“诚心事大”成了这一时期朝鲜对明外交的主旋律。特别是朝鲜在遭受日本入侵的危急关头，明朝出兵援助，使朝鲜避免了亡国灭种的重大危机，更使朝鲜的“事大”之意达到巅峰。有明一代，许多朝鲜使臣直接将纪行中国的文字命名为“朝天录”，一个“天”字，准确地概括了这一时期朝鲜对明代中国的总体社会集体想象。目前，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关于明代朝鲜使臣纪行中国文字的提法还没有完全统一，有人称之为“使行录”，有人统称为“燕行录”，还有人称之为“华行录”。实际上，这些说法要么是单纯着眼于朝鲜的政治外交行为，要么是无视朝鲜眼中明清中国形象差异的笼统概括，要么是单纯着眼于朝鲜外交的目的地，都忽视了朝鲜对明代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和朝鲜眼中明代中国的真正形象，所以这些提法都是不准确、不全面的。朝鲜使明的“朝天录”和使清的“燕行录”应该截然分开，这是不同范畴的概念。概念的明确区分可以直接体现出朝鲜眼中的明代中国形象和清代中国更为复杂的形象的巨大差异。关于这一点，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清入主中原后，受中国传统“华夷观”的深远影响，出于对明汉人政权的怀念和对清少数民族政权的厌恶，朝鲜使臣们不

① 杨昭全、韩俊光：《中朝关系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第228页。

约而同地将纪行明代中国时几乎统一使用的“朝天录”一词以“燕行录”替代。在朝鲜使臣心中，朝鲜才是汉文化最正宗的继承者和守护者，其自身的文明已经远远高于其他的异邦和异族，是名副其实的“小中华”。而取代明政权统治中国的清政权，其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朝鲜，是真正意义上的“夷”，与正统汉人性质的明政权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更遑论以“天”尊之。再加上清在与明的战争中，曾几次攻打朝鲜，最后朝鲜被迫与其签订城下之盟，俯首称臣。战争为朝鲜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而屈服于清政权的武力压迫，又给朝鲜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所以有清一代的朝鲜纪行中国的文字由“朝天录”转变为“燕行录”，取北京古称为燕京，记入燕行迹之意。纪行文本用词的集体转变，体现了朝鲜鲜明的“华夷观”。当前，在学界研究中，“朝天录”的研究热度远远低于“燕行录”的研究，而明清中国形象的研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因此，以朝鲜古代汉籍“朝天录”中的明代中国人形象研究为主要切入点，对“朝天录”中反映出的明代中国形象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本书以众多“朝天录”作品为研究文本，以比较文学形象学、比较文化学及考据学的理论为指导，对“朝天录”中的明代中国人形象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阐述和论证了高丽末期和朝鲜朝的外部形象和内部形象，为研究明代中国人形象奠定了立论基础；分别对朝鲜使臣出使中国时接触最频繁的、最有代表性的明代中国的平民形象、明代中国的儒生形象、明代中国的官员形象以及明代中国的皇帝形象进行了全面和详细的分析；阐述了“自我”对“他者”的塑造过程；阐述了“朝天录”中明代中国人的“负面特征”；探讨了“朝天录”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笔者力求最大可能地探讨朝鲜使臣对明代各阶层人物的形象塑造，在探讨明代中国人形象的同时，对朝鲜使臣在形象塑造过程中折射出的内心情感的变化和若隐若现的自我镜像中的朝鲜形象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以期使我们了解持续几千年的中朝关系的某些特性，理解朝鲜对中国复杂的民族心理；以期为我国对朝鲜半岛的外交政策的制定，维护东北亚和谐局面做出文学研究上的努力。

在本书的形成过程中，笔者先后对明代朝鲜使臣的使行路线进行了两次踏查，分别考察了辽宁境内、河北境内以及北京、南京市内的众多历史遗迹，设身处地，寻找历史感觉，以期本课题研究能够更加客观和真实。

本书是以笔者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朝天录”中的明代中

国形象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朝鲜古代汉籍‘朝天录’中的明代中国人形象”(10XZW016)为基础,扩展修改而来。

本书付梓之际,笔者要感谢资助本书出版的延边大学朝鲜半岛研究院;感谢朴文一教授、李岩教授、金柄珉教授、韩国首尔大学尹汝卓教授;感谢金洪培先生、朴成日与赵妍伉俪、朱美花与石吉梅女士、朴政君先生;感谢妻子朴莲顺女士!

笔者后学,水平有限,经验欠缺,书中舛误之处肯定不少,恳请读者予以指正。

目录
CONTENTS

绪 论	1
第一章 “注视者”的形象及特征	12
第一节 14 ~ 17 世纪朝鲜半岛的社会状况	13
第二节 “注视者”的思想理论体系	22
第三节 “注视者”的观察载体——朝天使臣	26
第二章 “朝天录”中的中国人	34
第一节 “他者”的基石——平民	34
第二节 “他者”的智库——儒生	64
第三节 “他者”的支柱——官员	89
第四节 “他者”的主宰——皇帝	128

第三章 “注视者”对“他者”的塑造	167
第一节 朝鲜对明朝的社会集体想象	167
第二节 “自我”对“他者”的塑造过程	172
第三节 “注视者”眼中“他者”的“负面”特征	189
第四章 “朝天录”的价值	199
主要参考文献	221

绪 论



一 “朝天录”的研究现状

1. 国内的研究现状

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对“朝天录”的研究起步较晚。台湾学者张存武于1967年著《介绍一部中韩关系新史料——燕行录选集》^①，首次向中文学界介绍了明清时期朝鲜使臣留下的记录，此篇文章应视为中国进行“朝天录”研究的发轫。但限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国内学术界关注者寥寥；1992年，张存武著《推展韩国的华行录研究》^②，此篇文章专门谈到朝鲜纪行中国文字的体裁，并从其资料价值方面指出其研究的重要意义，但仍然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注意。这里，张存武先生将朝鲜纪行中国的文字命名为“华行录”，显然对“朝天录”的文化内涵挖掘得不够深入；1999年，大陆学者张德信与日本学者松浦章联合发表《一部研究中朝关系的重要史料——〈朝天录〉评价之一权近〈奉使录〉》^③，对“朝天录”中具有代表性的、朝鲜使臣权近的《奉使录》的史料价值进行了探讨。两位学者在文中将明代朝鲜纪行中国的文字明确定义为“朝天录”，说明他们已经对“朝天录”的文化内涵有了清醒的认识。但两位学者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对

① 《思与言》第3卷第6期，1967年1月

② 《韩国史学论丛》（水村朴永锡花甲纪念），韩国探求堂，1992，第1081~1085页。

③ 《史学集刊》1999年第3期。

“朝天录”进行研究，还没有进入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范畴。此后，更多的国内学者们开始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朝天录”进行研究。如陈潮的《明清之际中韩宗藩关系探索》^①、孙卫国的《〈朝天录〉与〈燕行录〉——朝鲜使臣的中国使行记录》^②、刁书仁的《洪武时期高丽、李朝与明朝关系探析》^③、张德信的《朝鲜使臣眼中的运河与淮安——以权近〈奉使录〉为中心》^④和《朝鲜辩诬陈奏上使赴明前后——以李廷龟〈庚申朝天录〉为中心》^⑤、陈尚胜的《明清时代的朝鲜使节与中国记闻——兼论〈朝天录〉与〈燕行录〉的资料价值》^⑥、刁书仁的《朝鲜使臣所见的建州社会——兼论后金建国前与朝鲜的关系》^⑦、高艳林的《明代中朝使臣往来研究》^⑧、葛兆光的《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⑨、邱瑞中的《谁赴松锦吊忠魂——〈燕行录〉的史料价值之七》^⑩、刘勇强的《燕行录与中国学研究》^⑪、刘宝全的《关于告急使权挟的燕行之旅》^⑫等。这些学者对“朝天录”中所蕴含的巨大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外，还有学者对国内外“朝天录”的研究动态进行介绍，如李岩、池水涌的《〈燕行录〉一百卷在韩国面世》^⑬。从这些论文成果来看，目前，国内“朝天录”研究的主体力量还是历史学者，他们偏重于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朝天录”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尚无人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切入对“朝天录”，即有明一代朝鲜使臣书写的记行中国的典籍进行整体性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为“朝天录”更为全面、深入和复杂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专著方面，山东大学陈尚胜教授等所著的《朝鲜王朝（1392—

① 《学术论坛》1997年第1期。

②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1期。

③ 《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④ 《淮阳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⑤ 《大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⑥ 《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⑦ 《满族研究》2001年第2期。

⑧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⑨ 《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

⑩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7卷第2期。

⑪ 《韩国文学研究》第24辑。

⑫ 《亚洲文学研究》2008年第14辑。

⑬ 《当代韩国》2002年春季号。

1910)对华观的演变——〈朝天录〉和〈燕行录〉初探》^①，分别介绍了八部比较有代表性的“朝天录”，并借此对已知“朝天录”的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同时进一步揭示了朝鲜使臣对华观的演变过程。该著作在国内的“朝天录”整体研究中跨出了一大步，开始涉及明代朝鲜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问题。但此专著的研究所依据的文本为1978年台湾硅庭出版社出版的《朝天录》中的一些篇章，受文本收录的篇幅所限，还有许多重要的和有代表性的“朝天录”没有涉及；北京大学葛振家教授著《崔溥〈漂海录〉评注》^②，对因受暴风袭击，乘船漂流到中国浙江的朝鲜官员崔溥所著的《漂海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漂海录》的内容涉及了明朝弘治年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对于研究我国明代的海防、政制、司法、运河、城市、地志、民俗及两国关系等，提供了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第一手资料，极具参证价值。但是，需要明辨的是，崔溥是因自然灾害而偶然漂流到中国，并留下了关于中国的记载，其行为是个人行为，而不是接受指派的国家间外交使行行为，所以，《漂海录》并不属于“朝天录”的研究范围。尽管如此，葛振家先生的研究成果为“朝天录”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有益的方法和思路；天津师范大学刘顺利教授著《半岛唐风——朝韩作家与中国文化》^③，专辟一章讨论“朝天”与“笔谈”，对郑梦周的《赴南诗》进行了分析，并认为“燕行录”是700年积累的形象学资料。尽管他将朝鲜使臣使行中国明清的记录统称为“燕行录”，但著作肯定了“朝天录”的形象学意义；内蒙古师范大学邱瑞中著《燕行录研究》^④，分上下两编阐述了朝鲜使行文学的重要史料价值；延边大学徐东日著《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以“朝天录”和“燕行录”为中心》^⑤，考察了朝鲜看待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特殊视角、价值取向以及朝鲜民族对中国的总体想象。但全书重心在于对“燕行录”的总体体察，“朝天录”涉之不多；中央民族大学李岩教授与池水涌、俞

① 陈尚胜等：《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朝天录〉和〈燕行录〉初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②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线装书局，2002。

③ 刘顺利：《半岛唐风——朝韩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邱瑞中：《燕行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⑤ 徐东日：《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以“朝天录”和“燕行录”为中心》，中华书局，2010。

成云等门下弟子所著三卷本《朝鲜文学通史》^①，专辟一章对朝鲜朝前半期的使节文学进行研究，内容涉及对“朝天录”的总体评价、权近的使行诗、李晔光的“朝天诗”和北京“腊梅诗”等方面的研究，内容虽只设一章，但却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在学位论文方面，复旦大学杨雨蕾著《十六至十九世纪初中韩文化交流研究——以朝鲜赴京使臣为中心》^②，此博士论文以韩国东国大学林基中教授编的《燕行录全集》为研究文本，对“朝天录”和“燕行录”中的使节团的构成、出使任务、路线、中朝两国的文人交往、汉籍东传、朝鲜西学、朝鲜华夷观的演变和北学的兴起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论述。此论文从历史学的角度切入，挖掘了中国社会的一些文化特质，颇具学术价值。但本论文研究重点也是放在了对“燕行录”，即有清一代朝鲜使臣典籍的重点解读上。此论文已经以《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为题，于2011年1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予以出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刘晶于2013年著硕士学位论文《“朝天录”所见明代北中国地理专题研究》，此论文系统运用“朝天录”史料，对明代北中国的地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补充了中国史料的不足，描绘了细致而全面的北中国图景，也为探讨朝鲜使臣的活动、记忆、心态和中朝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纵观国内的这些研究成果，目前，尚无人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对“朝天录”，也就是自大明肇立至朝鲜臣服清政权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朝鲜使臣文学进行专题、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因此，比较文学形象学意义上的“朝天录”的整体研究在目前基本上还属于一个空白领域。

2. 国外的研究现状

20世纪60年代，韩国利用其独有的优势，率先开始对朝鲜使臣纪行文字展开了收集整理工作，所以韩国“朝天录”的研究成果与中国国内相比，相对来说更早更丰富一些。由于韩国学术界大多数学者将朝鲜使臣出使中国的纪行文字统一称为“燕行录”，也有的学者称之为“使行录”，因此，在考察韩国学界关于“朝天录”的研究成果时，这些成果往往体现在对

① 李岩、池水涌、俞成云：《朝鲜文学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② 杨雨蕾：《十六至十九世纪初中韩文化交流研究——以朝鲜赴京使臣为中心》，博士论文，复旦大学，2005。

“燕行录”或“使行录”的研究之中。

纵观韩国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如下两个特点：

第一，从整体上对“朝天录”进行考察，从而揭示“朝天录”的一些特点。如金圣七发表《燕行小考》一文^①，尽管该文并不专门涉及“朝天录”，但是它首开“燕行”研究之先河，对明清时朝鲜使行的种类、路线和使行人员的构成初作简介，并专门讨论使臣在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还特别论及了部分使臣的“北学”思想，为后来学界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石。研究过程中，作者利用到部分颇具影响的“朝天录”，如明时期出使中国的许篈的《荷谷朝天记》，初次展现“朝天录”所具有的重要史料价值；1976年，黄元九发表《〈燕行录选集〉解题》^②，较为全面地概括论说了“使行录”，对“使行录”出现的背景、种类、内容和价值作了总体说明；1995年，韩国东国大学林基中教授在大规模收集整理“燕行录”的过程中写下《燕行歌与燕行录研究》一文^③；2002年，林基中教授在《燕行录与韩国学研究》一文中，对“燕行录”的搜集与整理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在文后按年代顺序罗列了“朝天录”和“燕行录”的文本名称、作者生卒年和出使时间，为“朝天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基础资料；2003年，姜春爱的《韩国关庙与中国关庙戏台》^④分析了“使行录”中有关明清关公信仰、关帝庙以及戏台的记载内容，并利用这些材料与韩国的关帝庙进行了对比；2004年，韩国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所金台俊教授著《中国燕行路程考》^⑤，对朝鲜使臣前往中国的朝贡路线进行了详细的考证；2004年，苏在英著《燕行的山河和燕行使的历史意识》^⑥，以“燕行录”为基本史料，介绍了朝鲜使臣“燕行”所经的中国山川，并整理他们的部分感想；弘益大学的崔康贤著《对水路朝天录的研究》^⑦，对朝鲜使臣的海行路线进行了研究；2006年，金璟绿著《朝鲜时代使行与使行记录》^⑧，对朝鲜时代

① [韩]《历史学报》第12辑，历史学会，1960。

② [韩]《民族文化》1976年第2辑，韩国民族文化推行会。

③ [韩]《大宇财团消息》1995年冬季号，No. 53。

④ 《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戏剧》2003年第3期。

⑤ [韩]《东洋学》第35辑，韩国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所，2004。

⑥ [韩]《东洋学》第35辑，韩国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所，2004。

⑦ [韩]《人文科学》第5辑，1997。

⑧ [韩]《韩国文化》第38辑，2006。

的使行文学进行了总体考察；崔韶子著《“燕行录”研究提案》^①，对“燕行录”的研究提出了总体研究思路；2008年，金暻绿著《朝鲜时代朝贡体系和对中国外交》^②，对朝鲜时代朝鲜与中国的朝贡体系和对中国的外交进行了系统研究；2008年，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生裴英姬著《燕行学与韩中关系——韩国明清史学会夏季研讨会会议纪实》^③，对2008年7月在韩国江陵大学举办的韩国明清史学会夏季研讨会会议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并对从事“朝天录”、“燕行录”研究的崔韶子、徐仁范、金暻绿、李应龙、郑恩主等教授关于“朝天录”、“燕行录”研究的主题发言内容进行了系统整理；2009年裴英姬著《〈燕行录〉的研究史回顾（1933—2008）》^④，对韩国1933年到2008年“燕行录”的研究历史进行了总体回顾。

以上这些成果都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朝天录”的研究范围，为综合研究“朝天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二，以某一作家或某一部、几部作品为研究重点，力图揭示某一文化现象。

如1982年，崔康显在所著的《韩国纪行文学研究》^⑤中特别对几部韩文燕行歌辞的内容和文学价值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1987年，尹南汉的《〈朝天纪〉解题》^⑥介绍了许筠的《荷谷朝天纪》的内容；2004年，金东珍的《许筠之大明使行与阳明学变斥》^⑦，考察了许筠使明期间与中国文人进行的心学之辩；2005年，高丽大学权任熔的《明中期朝鲜宗系辩诬——以权拨的〈朝天录〉为中心》^⑧，对权拨的使明辩诬活动进行了考证；2006年，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纂研究馆的李迎春著《丙子胡乱前后的朝鲜、明、清关系与金堉的〈朝京日记〉》^⑨，对“朝天录”的最后一个记录者金堉的《朝京日记》做了深入的研究，对金堉所行的路线、“丙子胡乱”前后的朝鲜、明、清关系与金堉的外交活动以及明末朝野的动向和民间风物进

① 明清史学会第17回夏季学术大会特别论文，《明清史研究会报》第30辑。

② 〔韩〕《明清史研究》2008年第30辑。

③ 《明代研究》2008年第11期。

④ 《台大历史学报》，No. 43（2009/06）。

⑤ 韩国一志社，1982。

⑥ 〔韩〕《爱山学报》第5辑，1987。

⑦ 〔韩〕《文化史学》第21号，2004。

⑧ 〔韩〕《明清史研究》第24辑，2005。

⑨ 〔韩〕《朝鲜时代史学报》第38辑，2006。

行了论述；2007年，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郑恩主的《明清交替期对明海路使行录图研究》^①，以众多珍贵的使行图录为基础，从17世纪朝明关系和使臣的海路行使、使臣的海路行使日志的撰写目的、使臣海路行使记日志的主要内容及史料价值等方面对明晚期朝鲜的海路使行活动进行了研究；2008年，世宗大学李应龙的《“壬辰倭乱”前后的朝鲜和明朝学者们的学术交流》一文，分别从阳明学的论争和朝鲜学界的批判、尹根寿和陆光祖的朱陆论辩、柳成龙眼中的明朝国子监与晚年的立场、李廷龟和宋应昌的《大学》讲解等四个方面论述了两国学者思想上的交流与碰撞；2009年，仁荷大学金英淑的《明末的中国社会和朝鲜使臣的外交活动——以金堉的〈朝京日记〉和〈朝天录〉为中心》^②，以金堉的文本为中心，集中探讨了金堉的“朝明两益论”；公州大学教育大学院汉文教育专攻李圣炯的硕士论文《对白沙李恒福〈朝天录〉文学的研究》^③分五部分对李恒福的“朝天录”进行了论述，其中关于使行文学与“朝天录”概观、“朝天录”的文学世界以及“朝天录”的文学意义等部分较有价值。此外，还有檀国大学汉文教育科李在元所著的《芝峰汉诗研究》^④，对多次出使中国的李廷龟的汉诗进行了研究；顺天乡大学的朴玄奎著《金中清的〈朝天录〉与被否定人士许筠》^⑤，对同为使节团成员的金中清和许筠之间由于思想上的差异而造成的矛盾进行了论述。

此外，日本以夫马进和松浦章为代表，主要针对“燕行录”与日本学研究的关系、清代朝鲜使臣洪大容和申在植的活动和思想、现存于日本的部分“燕行录”的整理与研究等问题进行了零星的研究。在俄罗斯，目前文献可查的只有俄罗斯学者西姆比尔采娃·塔吉雅娜·米哈伊洛夫娜所著的《17世纪末—19世纪中叶俄朝在北京的接触（根据朝鲜使臣的日记）》^⑥一篇文章。相对于中国和韩国而言，日本与俄罗斯的研究较为零散，尚未形成规模，而对“朝天录”的研究则根本没有涉及。

基于以上所述的研究成果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笔者以韩国东国大学

① 〔韩〕《明清史研究》第27辑，2007。

② 〔韩〕《明清史研究》第31辑，2009。

③ 韩国公州大学校教育大学院，2005。

④ 〔韩〕《汉文学论集》，槿域汉文学会，2001。

⑤ 〔韩〕《溯上古典研究》第22辑，溯上古典研究会，2005。

⑥ 《远东问题》1998年第6期。

林基中教授收集整理、东国大学出版部 2001 年出版的《燕行录全集》为主要研究文本，文本选取起始时间界定为 1368 年大明肇立至 1637 年朝鲜朝屈服于清的这一时段。以这一时段的整体文本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为指导，集中探讨中外学者尚未涉足的“朝天录”中的明代中国人形象，以拓宽中朝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

二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

首先，从开大明纪行之轫的郑梦周始，至使行于中路而适逢本国山河巨变的金堉而终，朝鲜使臣笔下的记载年代跨度达到了整整 251 年，几乎囊括了整个有明一代。作为记录了丰富“他者”形象的“朝天录”，它在比较文学形象学领域具有典范的意义。“朝天录”是朝鲜古代游记文学的代表，更是研究中朝文化关系的重要文本。而目前，国内外尚无学者以此文本为研究对象，对有明一代朝鲜眼中的中国人形象进行整体而系统的研究。因此，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层面上讲，选取“朝天录”进行中朝比较文学的研究，本身就具有拓宽朝鲜—韩国学学术研究领域的意义。

其次，游记文学向来是比较文学的传统研究领域，法国学者谢夫莱尔说：“自古以来，旅行是与外国人相遇的最好办法”^①。边界之外的旅行是对“他者”的寻求，是认知“自我”最短的道路。中国，作为一个地理、政治和文化的概念，本身就是在他者的不断认识中形成的。游记作者往往扮演了双重角色：他们既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建构者和鼓吹者、始作俑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集体想象的制约，因而他们笔下的异国形象也就成了集体想象的投射物，所以在形象学中的游记研究实际上必须绕经一个民族的思想史、心态史^②。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形象具有“言说自我”和“言说他者”的双重功能，如果把形象塑造者比作一面镜子，那么，“朝天录”中的明代中国人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 14 世纪到 17 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域外镜像。其中，既有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客观反映，也有因文化过滤或文化误读而造成的有意或无意变形。而作为中国形象塑造者的朝鲜文人使臣，其身份不仅仅是政治家，而且还是文学家、

① 谢夫莱尔：《比较文学》，PUF，1989。

② 孟华：《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序》，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